

大学语文新教程

吴伟凡◇主编

(第四版)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大学语文新教程

吴伟凡◇主编

(第四版)

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
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语文新教程/吴伟凡主编.--4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38-2776-3

I. ①大… II. ①吴… III. ①大学语文课—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981 号

大学语文新教程(第四版)

吴伟凡 主编

Daxue Yuwen Xinjiaocheng

责任编辑 田玉春

封面设计  砚祥志远·激光照排
TEL: 010-65976003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砚祥志远激光照排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96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版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18 年 5 月第 4 版 2018 年 5 月总第 8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2776-3/H·189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四版序言

这是一个奔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追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时代。面对新主题、新思想、新成就、新任务,我们的语文教育也应以此为新契机、新动力,拥有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诚然,语文学科是个古老的学科。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华夏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的局面,汉语文成为承载民族文明、积淀民族历史、历练民族智慧、颐养民族休息的重要信息系统,也成为炎黄子孙源自本我、植根壮大、凝心聚力、精诚团结的厚重的精神土壤。古人云:“文以载道”。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传统文化精粹篇章,直接蕴藏着我们民族深沉富饶的文化能量,凝聚着一代代贤人智者的人文情感,也闪耀着华夏俊杰们个性思考的理性光芒。

今天,语文学科更是个发展的学科。首先,我们的生活在发展。多媒体的时代激情裹挟着我们的人生脚步,数字化、实时性、交互性的新世界引领我们不断调整自我的思维方式与交流习惯,语文教育也在不断接受全球化、市场化和新媒体的挑战中进入对信仰、精神、价值、传统的深层守候与多样性发展的新时代。其次,我们的人民在进步。“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活在伟大祖国怀抱的中国人民共同面临着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都愿拥着簇新的理想,站在全新的高度,担当承传与创新共举的民族使命,既勇于寻求个性化的发展、乐于勾画自己的人生蓝图,更甘于在民族复兴梦中薪火相传,做汉语文化的热爱者、践履者。再次,我们的视野在博远。现代化人才不仅需要我们在博古通今中养胸襟之高远、在博征智引中求思维之放达,更需要我们站在世界的高度去意识我们共处的共同体之中语言文字传播形式与内容的深刻变化。要发展,要新创,先要对本族语言与文化积极认同、由衷尊崇,也要对多元文化有接纳,有了解,有比较,有甄别。培育有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这不啻是一项中华复兴梦中的新事业。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我们的大学语文教育虽然只是弘扬民族文化、进行传统语文教育大厦中的一片玉瓦,但万川归海,意义自在。本教材在主题与文选的框架下已作为我校大学语文教材多年,初版由朱琳、吴伟凡主持编写,张剑、李景强参与策划,顾明和吴伟凡负责全书统稿,吴伟凡编写第一讲、第九讲和

第十三讲,赵建梅编写第二讲,李会来编写第三讲,田小野编写第四讲,汪艳菊编写第五讲,郑华编写第六讲,张小乐编写第七讲,刘建强编写第八讲和附编二,彭利芝编写第十讲,顾明编写第十一讲和附编一,张崇婉编写第十二讲,朱琳编写附编三。为更好地服务于大学语文教学新目标与新内容,我们着手对教材进行了纠错与删调,加入了戏曲与当代网络小说等新内容,并增调了一些最新阅读书目。新调与新增章节均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教师写作。其中第三讲由李培涛编写,第九讲由吴伟凡编写,第十二讲由司新丽编写,第十三讲由戴新月编写,修订版由吴伟凡总体负责并统稿。

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大学语文的教改长路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恒长使命中,愿我们携手共勉。

2018年2月

目 录

第一讲	北风南骚	
	——先秦诗歌的原创魅力	1
第二讲	诸子争鸣	
	——先秦儒、道、法、墨主要思想概略	24
第三讲	“班马”风采	
	——两汉史传文学典型	46
第四讲	魏晋风度	
	——生命深处的吟唱	68
第五讲	盛唐气象	
	——盛唐诗歌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质	92
第六讲	词林芬芳	
	——唐宋词特征述要	116
第七讲	骈古之争	
	——古典散文史上的独特风景	134
第八讲	戏曲人生	
	——元代文人与杂剧	165
第九讲	悲喜舞台	
	——情文并茂的角色艺术	184
第十讲	章回经典	
	——“四大奇书”及《红楼梦》	205
第十一讲	五四变奏	
	——文学革命与鲁迅	226
第十二讲	多元异彩	
	——中国当代小说流派一览	248
第十三讲	青春飞扬	
	——中国当代新锐文学审视	267

附编一	音律之美	
	——诗词格律初阶	301
附编二	理性之光	
	——文学的本质、创作与接受	320
附编三	“小说”大观	
	——西方小说发展流脉	338

第一讲

北风南骚

——先秦诗歌的原创魅力

西方当代人文学者卡西尔说：“诗是人类的母语”。在人类精神交流的最初需要里，诗歌是人类心灵被符号化的最早和最激动人心的文学样式。约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我国文学事业的朝霞时期，与西方古希腊史诗似乎相约前后诞生的是以“国风”为代表的北方的诗歌总集《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南方的诗歌总集《楚辞》。作为我国诗史的第一板块，两部诗集具有“垂范千古”的深刻意义。

一 《诗经》的类型化解读

（一）《诗经》的成书与后世解诗类型

周朝伊始，统治集团十分关注现实政治与历史人事的关系，并利用诗歌的形式将这些理性与感性的最初震颤进行整合。《诗经》中的诗篇虽都是上古诗人创作所得，但具体而言，这些诗歌被收集的渠道却有所不同：一是献诗所得，即贵族作者把自己创作的诗歌直接献给国家，正如《国语》所说，“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叟赋，蒙诵……”。二是采诗所得。周王朝的乐官为观风俗，知薄厚，定期去民间收集不知名作者（无名氏）的诗歌。《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这样的情节：“仲春三月，群聚者将散，有手持木铎者行于市以采诗……”。三是周王朝乐师为祭祀与宴飨等国家文化事业的需要应职应时创作的诗歌。正是周王朝主管礼乐文化的乐官——周太师们，在上古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之间，通过对这三种主要渠道获得的诗歌作品的韧性收集与专业整理，共同编纂成就了这样一部合民歌与贵族、王室的作品为一体的伟大诗集，古称《诗》或《诗三百》。

自从孔子把“诗”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进行整理、教学和批评与传播以来，《诗三百》就不再是沉默而封闭的文字了。孔子是第一位给《诗三百》的阅读与批评提供思想的人。从近年来对楚帛书孔子《诗论》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中我们看到，孔子的《诗论》是最早而且是最权威的《诗三百》批评著作。当代学者马银琴等

认为,《诗论》或者立足于伦理政治,或者立足于歌词本身,或立足于历史事件,表达了对《诗经》解读的全面立场。由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不能一览孔子《诗论》中的具体内容,但他毕竟第一次建立了《诗三百》的解读与批评理念,并且为今后《诗三百》的解读工作奠定了全面而宽广的思路。

两汉时代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诗三百》解读时期。在《诗》经秦火复又流传之际,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一统政策,《诗三百》终于地位至尊并摇身成经,解读的任务就更显重要而关键起来。由于《诗经》起初并无标题,所以其内容的指向范畴是模糊的,还有流传时间的久远及形象性的内容诸因素,都给后世说诗者留下了广阔的理解空间。

当时解读并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即历史上所谓的“四家诗”——齐之轅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与赵之毛亨和毛萇。四家实为两家。鲁、齐、燕三家诗为今文学,而且内容多有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或神学谶纬,虽在汉代先后立为博士学官,盛极一时,但由于是神学与时学传授与解读类型,所以不久就不再流传。赵诗也即“毛诗”,为古文学。东汉以后,由于毛亨、毛萇叔侄传授的《诗经》用古文记载,解读较三家诗平实、准确,不仅注重名物训诂之意义讲解,而且特别形成了一己说诗的宏观与微观系统,形成深刻的文化影响,遂独传于世。

毛诗对《诗经》的解读具有文化开拓和垂范意义。为明了《诗经》意旨,他们不仅为之作有总序,即“诗大序”,站在儒家立场,全面表达对诗这种艺术门类的基本原则及《诗经》内容形式的理性理解,而且还在每篇之下具体而有针对性地阐释诗篇内容与形式上的意义,被称为“诗小序”。其中,他们建立了“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序诗方式,根据创作诗歌的当时情形与历史状况,或美德政之崇高,或刺时代之败劣,开了对作品得出带有浓厚主观色彩和工具理性的规定与评说的先河,也即建立了《诗经》经学解读的思路,加上其后诸大儒郑众、贾陆、马融等申明毛义,郑玄《诗笺》又“宗毛为主”,并再作《诗谱》,贯彻毛诗“以史说诗”的解经观念,将 300 篇贯串为一诗史系统,所以古文学之《毛诗》盛行于世,其建立的经学解读思路遂在历史的延续中渐成范式。直到宋代朱熹等学者的《诗经》学另辟蹊径,不全以诗序为宗,形成深远影响,终于在明清之际产生了类似文学解读的新类型。

(二) 两种最主要的《诗经》解读类型

从《诗经》首篇开始,所谓经学解读的方式就特别鲜明地被使用起来,即以儒家的历史意识与文化原则为解说《诗经》的基本依据,将《诗经》作为儒家干预政治的手段和伦理教化的工具,对《诗经》的意义系统进行偏于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的历史解释与政教附会。对《关雎》一诗,“诗小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诗小序”认为《关雎》的主题是颂美

周文王妃太姒之德的,其德在于她见到窈窕淑女便辗转反侧,替文王寤寐思求,绝不纵恣己色以求专宠。这种解释一直被承袭下来,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是如此,宋朱熹的《诗集传》在这首诗的解释上也是如此。《诗集传》曰:“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这段文字认为,《关雎》是宫中之人颂美姒氏和文王两厢和乐又情挚有别的关系的,与毛诗解法一脉相承。他们为成就意义所构筑的所有解释都以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原理为轴心,利用想象的流动性和可跨越性生发出政治教化的理性意义。

文学解读法则放弃对《诗经》基于政治与伦理层面的解释,也不把《诗经》作为对历史事件曲折美刺的声音,而是基于文学形象与情感的把握去触摸初民那丰富久远的心灵情怀。从清代始,就有人以这种眼光读《诗经》,遂有不少新的发现。《关雎》这首诗终于不再被视为是颂美后妃之有德,而认为它是一首表达民间男欢女爱的情歌了。例如:屈万里以为是“祝贺新婚之诗”;闻一多《风诗类钞》说,“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余冠英《诗经选译》说,“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苗条形象使他寤寐不忘,他整天地想:要是能热热闹闹地娶她到家,那该多好”。

我们重新对《关雎》进行文学梳理后,则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章,以雎鸠和鸣比而后兴,引出一位娴雅的好姑娘,一般的女子是不值得为她“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在这一点上和《关雎》接近的倒是《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这位姑娘正是君子心仪而合适的配偶。次章,以采荇为喻,“参差”是荇菜长短不齐的样子,“左右”有到处找寻的意思,采到如意的荇菜不容易,所以要在仔细选择上下些工夫。得到“窈窕淑女”也不容易,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在追求她。三章接二章递进一层,求之既不可得,则更加深了对她的思念,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在想她,思念是如此深挚绵长,以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四章、五章,复以采荇为喻,想象一旦求得她,必以和美的音乐迎接她,最终要使心上人高兴,表达了主人公如若梦想实现将怎样欣喜幸福的心情。全诗以追求、思念和梦想为主旋律,展示了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的心灵故事。此诗在温润平和中潜隐着对爱情神往的激情,是代表《诗经》总体风格的作品。

再看《诗经》中另一首诗《蒹葭》(参见文选二)的解读情况。

此诗“诗小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汉代郑玄的《笺》则阐发了《诗序》之意,说是“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并谓诗中所追慕的“伊人”为“知周礼之贤人”。朱熹解诗,多不信“诗小序”说,将

之斥为穿凿。而对《蒹葭》，他虽未提出明确的见解，意见却提得颇为中肯。《诗集传》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郑玄不仅从此诗引申出诸如襄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引申出周礼这样的伦理问题，虽然水这个意象在古代有礼的象喻，但牵强联系，勾连古人古事，使诗意基本游离于诗歌展露的美丽而凄婉的意象之外，这正是经学诠释的方式。

而从文学的层面切入，《蒹葭》成为一贯以“慷慨悲歌”为主的《秦风》中的别致之作。既可以认为它是一篇美丽的情歌，也可以认为它深具象征意味，超越了一般爱情主题的境界和高度。而从情歌的角度说，它是一首比《关雎》诗意更加婉转浓郁，意境更加含蓄优美，而情绪也更加跌宕复杂、更加扑朔迷离的诗。深秋的清早，河边萧瑟的寒气笼罩着大片芦苇的河岸，苇丛上浓郁的雾气轻轻游走，清冷的白露悄无声息地凝结在芦苇那初生的叶片上……男子没有自信，犹豫徘徊，向往伊人，不知道自己能否获得对方的爱情，但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又充满情意，执着追求。此诗可以说是后代充满伤感的爱情诗的先导，故被后世称作“千古伤心之祖”。

《诗经·郑风·将仲子》（参见文选三）也是两种解读鲜明不同的例子。《毛诗序》曰：“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认为此诗是批评郑庄公的作品。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我们已经了解了郑庄公兄弟俩不尊亲和之伦常道理，在权力问题上互相倾轧的历史事件，毛公此说当依据这一历史。“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即是庄公奉劝弟弟公叔段不要继续违章乱法，以免铸成大错。这实在是以《诗经》作为诗史，并为了宣传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仁爱孝道，而不惜断章取义了。

从文学的角度解之，我们读到的则是姑娘要求情人别来她家，以免受父母兄弟及邻居责骂那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诗经》以降，整个中国古典诗坛上，以女性情爱为表述对象或话语中心的文本所在皆有，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关于女性的情爱意向。所以，有朱熹《诗集传》卷四曾言及郑风的“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的酸腐之见。这首诗也没躲开女性情感问题。一个处在爱情深处的女子，她内心之中充满了爱情带来的困惑和矛盾，她爱恋的对象总是不顾一切地追求她，要么爬墙，要么攀树，女子在感动之际忧从中来。她默默呼告：二哥哥呀，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怕。作品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直接而坦率地将女子困于时代和家庭礼法，想爱而不敢大胆地爱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外化出来，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女子内心深处斗争、惶惑、患得患失的爱情与社会关系的脉搏。

《诗经》中的很多诗篇都是用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理解和阐释的，解读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便大相径庭。

(三) 小结

我们由《诗经》的艺术形式探触它那丰富厚重的文本时,可以发现《诗经》中300余篇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风、雅、颂各体。虽然每篇都像是一座迷宫,令后世解读不尽,但它毕竟是采取现实的态度切入历史与生活的。虽然《诗经》在经学解读中不能完全背离文学想象,在文学解读中也难免持有经学惯性,但总体上说,诗是从这两个向度上延展着自身的意义系统的。古人经学解读的方式,其实也是人文解读的方式。在那样一种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初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创造性地开发着《诗经》的人文深意,为自己统治阶级的理念服务,在中国人的某种思维习惯与民族文化特征及民族性格方面形成富有诗意的影响。从文化理性的历史文学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诗经》无不真挚素朴地表达了初民对自然、对祖先、对他人及对自身的深情理解与由衷歌唱。这实在是比、兴、赋错综复杂的人生宽银幕!

二 楚辞是南楚文化土壤上结出的个性之花

(一) 楚文化的兴起与楚辞的产生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最终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据《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并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虽然最终楚为秦所灭。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种认识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芣》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猃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参见《史记·楚世家》)。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宗法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善,而且在信仰习俗方面,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楚

地仍是巫教盛行的地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直至战国,楚国军臣上下仍然“信巫,重淫辞”。《汉书·郊祀志》也说:楚怀王曾“隆祭祀,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来退秦师。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王逸的《楚辞章句》就讲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就是说,当屈原创作楚辞的时候,楚人还沉浸在一种充满鬼神的奇诡神秘的世界中。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甚至有更大优势。首先,应当看到,南楚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左传》记重耳奔楚时也曾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楚还是春秋战国时黄金产量很高的国家。另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青铜器编钟成为震惊世界的奇观^①。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更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正是由于谋生较为容易,才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低级求温饱活动,而进入如此高级复杂的物质生产领域之中。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不下于北方诸国。

其次,应该注意到,楚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六经”典籍早已在楚文化圈内流行,并且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很多次。这无不说明楚人在以一种积极学习的态度对待中原已有的先进文化资产,而这种态度正是超越与创造文化的前提。

“楚辞”一名,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原指楚地特有的诗歌形式,约在战国中后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楚地诗歌的基础上,融合南北夷夏的文化精粹,结合自身的政治际遇,创造出了《离骚》等系列新型诗歌作品。时至西汉,刘向收集屈原及其后学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作品,而以屈原作品为主,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就此完成了这部南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工作。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所以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东观余论》)

值得强调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楚赋,从“不歌而诵谓之赋”(参见《汉书·艺文志》)取义。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天问》等都是鸿篇巨制;《九章》若与《诗经》比较,其中的诗也加长了许多。如此篇制已显然不适宜歌唱。楚辞正是摆脱了篇幅短小、语言简朴的歌

^① 今湖北随州出土的一套编钟具备五个半八度,被中外专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只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之内。

谣形式,才得以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丰杂的内涵,表现富赡的情怀。

当然,除了楚歌谣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而这些或宽或窄的文化条件终究要在人身上发生综合作用,正如刘勰所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二) 屈原生命的个性状态

1. 屈原的生命历程与死亡选择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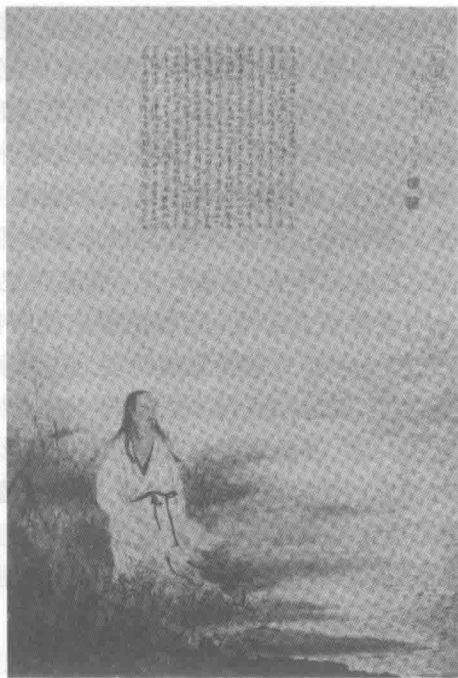
屈原是楚国的儿子,他的生命在楚国历史的前行流动中展开得庄严而充满个性。就现有资料而言,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轰轰烈烈迈向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为人“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官为左徒、三闾大夫。作为国家智囊精英的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拥有过一段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他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主张“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定“宪令”入手改革内政,努力实行其以法治国的“美政”理想;对外则竭力主张改变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方面的改革虽均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壮大,但由于屈原的路线和举措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冲突,终于招致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在群小的诬陷和毁谤之下,被不能明察的楚怀王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秦相张仪由秦至楚,并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起用屈原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终未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订立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政治与外交倾轧中,屈原的图强路线彻底失败,他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辗转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在祖国沦亡的噩耗面前,屈原悲愤难挨,遂自沉汨罗,永远谢世。

这是怎样一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中华巨人!他不仅具有平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而且智慧如此优越,人格如此峻洁,感情如此充沛。他那跌宕独一的身世遭际及特立标举的佳言懿行,尤其是他对生命最后的悲剧安排,使他的一生终于成为一首庄严圣洁而璀璨壮美的诗章,而屈原最终的悲壮赴死,就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个性化行为。虽然这是一种悲剧的行为,但却因其导致了中國思维取向上的一个新时代和文化中的一个新概念而深具意义。

那么,屈原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呢?在其理念思辨层面的主要逻辑是什么?通过作品我们隐约看到,在屈原的一切言行背后,都暗含着一个强大的观念,那即是对天的绝对信任。他认为天是最公正无私、磊落英明的,是看不见的宇宙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者。在它的裁决下,一切都会正大合理,即美德美政、美才美行就必有美实美果,而恶德恶政、恶才恶行就必定灭亡遭殃。可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血肉杀夺”的时代,楚国社会政治一片黑暗,代天立言的楚王善恶颠倒,昏聩不明,这使充满理想主义信念的屈原在观念的层面陷入深深的痛苦,在精神上深感无家可归,彷徨中他只有向天发问。在《天问》中,他一口气提出 170 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以自己的敢于问“天”,颇有气魄地表达了在天道观上对信念的怀疑和绝望,第一次以一种出自个体的理性醒觉,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发出了质问。天道的终极意义被解构着,使他视生命为微不足道的东西。



屈原

从现实实践层面说,中国诗人首先是思想家、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观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屈原一生怀着忠君、爱国和哀民的理想,而楚国沦陷的现实对屈原来说意味颇多。他再也无君可忠,因为楚君亡了;再也无国可爱,因为楚国败了;

再也无民可哀,因为楚人流离了。所有可以在现实实践层面抱持的理想全部化为乌有,作为政治家的使命和能够体现其人生价值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死,严峻的现实使他的人生变得没有了目标和方向,没有了追求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对思想家和政治家而言,肉体生命的继续只是偷生和苟活,真正的生命已终结,“死”难道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和解脱吗?

关于诗人之死,历史上有很多说法,如死于“尸谏”,死于国君之赐,死于返本寻根,死于不肯同流合污,死于以自杀的方式明志等。其实归根结底,是死于天道观念的坍塌和人生理想的绝望。而这就是屈原对儒家“杀身成仁”的生命哲学的毅然选择,也是他个性生命的最终完成。

2. 向内探索、物化个性的《离骚》

屈原首先是思想家、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在执着困难的政治追求中,在不曾停止的思想的攀缘跌宕中,幸好有诗,诗成了他向内进行自我探索的工具,也成了他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更成了他宣泄官场失意与政治忧伤的途径。无论正变美刺、咏史述志,还是吊古怀旧、远游寄意,所谓人生不幸诗家幸,源源不断的痛苦、悲哀和离乱成了他思想与诗的源源不断的养料。于是,在自美自悲的内在探索中,无数精彩绝艳的诗章从他的心灵深处飘向历史的天空,也成为他个性的完美显现。根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记载,现存屈原作品共25篇,即《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渔父》、《远游》和《卜居》,而《离骚》无疑是他的代表作。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能表现他理想情怀的深度与绚丽艺术个性的自传性长篇政治抒情诗。题目的意思是遭遇忧患。它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经常被用作楚辞的代名词。屈原在诗中展布了一个上天入地、求神问卜和寄兴花草这样深邃幽密与瑰丽浪漫的虚拟弘景,集中表现自己在两个向度上的斗争与挣扎。其一是与楚国群小党人激烈的政治冲突,其二是在困境中与自己本真生命中犹豫一面的心灵冲突。两种冲突纠结缠绕,不断激起感情的燃烧。此诗在情感表达的层次上,基本是以一生的经历为递进。

自“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个情感层次,从自身与历史的联系入手,十分郑重地自我介绍,不仅内美而且好修。他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接成串作为饰物,强调了天人和德的逻辑秩序及在此基础上自己对“美人”“美政”的后天追求。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他多么想以独特的方式将个体的人格与政治理想坚持下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然而,面对险恶的现实与人格和社会理想的交互冲突,他的心灵深处屡屡得到的是自美与自美不得而

引发的无穷自悲的强烈感受。于是,是否独善其身、归隐乡里的心灵问讯纠缠着他。

自“女须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个情感层次。带着斗争的决心与心灵的疑问,屈原在“女须冒原”之后,只有“就重华而陈辞”,并开始上见天帝与下求美女的更深一层的心灵探索活动。然而,见帝(喻与楚王沟通)之路被阻,求女(一说喻通事交涉者)之行无着,于是诗人的苦闷与悲愤不可遏止地更番迸发,这天道君心究竟是怎么了?

长诗的最后部分记述屈原在“去”与“留”问题上的情感抉择。在“问卜灵氛”与“决疑巫咸”之后,他决意出走。一旦驱使龙凤,挥斥云霓,遨游于无垠幻境中时,他的精神暂时离开了人间苦痛的深渊。但当他忽然俯临故乡的时候,感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好的幻境顷刻间毁灭了,他和他的马儿最终无法行动。屈原只有由衷感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就是屈原真实的心路历程。

从屈原诗中,我们的确看到了《诗经》中所没有和少有的特质:无处不彰显的“我”和深婉细腻的感情。屈原那充溢着个体思想与情怀的真诚个性拥有着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在迷狂冲动的激情中,他将充满原始意味的神巫故事、寓言神话引来了,他将楚人的俗词鄙语、淫祀巫风引来了,它们化作神秘的气氛、浪漫的情调、优雅的韵致和绮丽的色彩;他又引来兰花香草、荷衣蓉裳来驱遣比兴,象征自己品格之纯洁高尚;他更将群小党人比作萧艾臭草、恶禽秽物……人文世界与现实天地中一切有意味的物象都被任意驱遣着,并着上作者的色彩。这一切极具主观性的抒情系统与特点,专家们往往称之为浪漫主义。神话故事化的表现手法,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及回环往复,彰显主观的抒情方式,配合着忧愤深广的情思及厚重缜密的思理的表达等等,这正是他独一的气质和个性通过作品形式的播扬。也有论者说这是实证写实主义。其实,正是其个性特征的渗入成就了诗人的浪漫风格,又与巫文化的部分写实天然合一。

(三)《九歌》是南楚巫风的个性直观

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与《离骚》和《天问》相比,《九歌》的思想与情感分量似显稍轻,但《九歌》是屈原在艺术上最显价值的作品,它是在南楚宗教文化的特殊土壤上产生,并经由屈原文学升华的祭祀诸神的巫剧作品,或可说是南楚宗教巫风直接催生了《九歌》这样的艺术精品。其中,“九”代表多数,由《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11篇作品组成。祭祀的对象可分为天神、地神和人鬼三类。我们在这些诗中看不到构成《离骚》主要写作倾向的抒情主体的迫切表达,而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些直观着南楚宗教情怀的诗,是在含烟带雨的氛围中,被屈原个性地升华了的对美好生